

# 陳華建言「科技金融」



山東省政協委員、山東財經大學當代金融研究所所長陳華教授。本報濟南傳真

## 調研魯港金融合作 助力轉型升級

近年來魯港合作不斷深入，隨着山東「金改」的展開，金融合作隨即提上日程。數據顯示，香港是山東最大的外資來源地和境外投資目的地，已有40家山東企業到香港上市。而陳華也正在對「魯港台金融合作」進行專題調研。

在他看來，山東與香港、台灣之間在經濟上有着很強的互補性，三地合作能夠實現互利雙贏。對山東而言，香港、台灣能為山東帶來資本、人才和先進的經濟發展與管理經驗，利於山東「引進來」；同時，香港、台灣是亞太地區重要的金融、貿易、航運、信息等服務樞紐之一，可以作為山東企業走出國門的跳板，有利於山東「走出去」的戰略。而對於香港、台灣來說，山東省擁有龐大的原料市場與勞動力市場，山東的區域優勢和得天獨厚的資源，能為其投資贏得理想的回報，優勢互補，錯位發展，實現多贏。

### 「金融改革應更多強調國際慣例」

但不可迴避的是，「魯港台金融合作」也存在着一些制約因素。如在制度層面上，金融業受國家嚴格管控，地方政府的金融業務管理職能受限。CEPA 補充協議雖然允許香港證券業以合資形式進入內地，但僅僅是在上海、廣東、深圳等地進行試點，山東並未因此受惠。

此外山東尚缺乏全國性的金融交易平台，對吸引港資金融機構落戶、聚集國際資本、提升金融輻射力造成一定不利影響。因此，陳華強調，啟動魯港金融合作之前，山東應先釐清自身管理體制中一些不規範的因素，「應該更多強調國際慣例，淡化中國特色，這才是改革。」談及此前港交所拒絕了阿里巴巴的上市請求，陳華認為「港交所不因為企業規模大就輕易改變自身的規則，這一點值得敬佩，也值得內地思考」。



陳華調研企業。本報濟南傳真

近年來，小微企業貸款難催生了民間借貸的繁榮，而部分民間融資機構老闖捲款跑路的消息更是頻頻見諸報端，引發民眾對此類機構該如何監管的討論。山東省政協委員、山東財經大學當代金融研究所所長陳華教授在接受本刊專訪時呼籲，政府部門應釐清金融監管邊界，在釋放小額貸款公司帶來的活力同時，預防潛在風險。而要解決企業創新活力不足的問題，則應加大科技金融融合力度，並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圍繞創新鏈部署資金鏈，為產業轉型升級提供科技金融支撐。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于永傑、亓娜、實習記者 劉明秀



在陳華看來，民間借貸之所以大行其道，根本原因在於當下的金融體系不能滿足投資和貸款方的需求。一方面，銀行存款利率偏低，不能滿足儲戶的理財要求；另一方面，由於銀行「嫌貧愛富」的放貸傾向，實力相對薄弱的中小微企業普遍面臨着融資難問題，門檻較低的民間借貸應運而生。就此而言，融資公司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它能夠整合資金供求間的矛盾，並以此倒逼銀行進行改革。

### 「目前金融改革難度很大」

但在另一方面，也必須看到融資公司從事商業活動的風險，如果監管和經營不當，會對金融業和實體經濟帶來巨大損害，民間借貸資金鏈斷裂就是一個例證。而目前內地政府的金融監管體制也亟待完善。

陳華舉例說，各大國有銀行由銀監會和央行監管，小額貸款公司由地方金融辦監管，而融資公司則由於其暗藏的風險，對管理者的水平提出了較高要求，這使其成為了各監管部門都不願插手的模糊地帶。

政府管理的「缺位」或者「錯位」，給違法者以漏洞。「如何管控金融創新的活力與風險，將成為對政府管理職能的挑戰」。

出身金融系統的山東省省長郭樹清，到任以來即大刀闊斧推行金融改革。身為金融領域的學者，陳華亦積極發揮政協委員的作用參與其中。

「郭樹清省長是一個海派官員，到了山東以後多次強調與國際接軌。」但陳華也不諱言目前金融改革難度很大，「因為很多政策方面的突破，地方話語權不大」。

### 「未來競爭：科技與金融融合競爭」

2014年，陳華主持了《科技金融融合促進山東中小微企業創新能力提升》的國家軟科學重大合作項目，多次在提案中對山東的「科技金融」建言獻策：山東金融系統的老問題是國有銀行授信和貸款傾向於國有企業和大型企業，缺乏信用保障的民營企業和科技型中小企業融資則普遍較難。而尤應引起關注的是，目前山東企業的研發投入幾乎完全靠自主籌集。

數據顯示，2011年金融機構貸款在企業技術研發投入中僅佔1.46%，金融業對於研發投入的直接支持明顯不足，大大制約了山東企業的技術攻堅和產業升級。陳華認為，在山東「金改」過程中，應把促進金融機構支持企業研發投入列為改革重點之一。

近年來，科技金融得到各級政府的高度重視，然而，科技型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創新效率低下等問題仍然存在。陳華指出，未來競爭，不僅是科技的競爭，也不僅是金融的競爭，而是科技與金融融合的競爭。產業轉型升級源於科技與金融，科技金融融合促進中小微企業創新能力提升的同時，有利於轉方式調結構，有利於提高創新

軟實力。

### 「應將古人思想與現代要求融合」

山東一直以來存在着重、輕工業比例失調，大型國企佔比較高，先進製造業和新興產業發展尚不強勁，第三產業發展緩慢的結構問題，被俗稱為「大象經濟」。

出生在孔孟之鄉——山東濟寧的陳華在研究中不斷思考齊魯文化在當代經濟發展中所起的作用。在他看來，山東民營經濟發展遲緩，「魯商」難以同歷史上的「晉商」、「徽商」以及如今的「浙商」相比，一個重要掣肘力量是山東「重官輕商」的傳統觀念。

陳華舉例稱，傳統文化中的「學而優則仕」是鼓勵人們從政，「中庸」被理解為不提倡敢為人先，「輕利」也不提倡經商，安土重遷的本性也對營商不利，「官本位」的思想觀念根深蒂固，精英都流向了公務員隊伍。由於商人得不到應有的尊重，更增加了經商的困難，阻礙了小微企業的發展。

「在美國，第一等人是商人，而商人也願意做慈善事業、回報社會，因而義與利不是必然衝突的。現代人應當將古人的思想與現代社會的要求融合，而不應片面理解。對政府部門而言，應當改變『官本位』觀念，加快轉變政府職能，簡政放權，從管理企業轉變為服務企業。」陳華說。



陳華不斷思考齊魯文化在當代經濟發展的作用。本報濟南傳真



陳華在政協會議上講話。本報濟南傳真



陳華認為應積極發揮金融工具監管作用。本報濟南傳真

## 金融手段可成「反腐利器」

當今社會各類金融工具在不斷方便着人們的生活，而其在防止腐敗、建立廉潔政府方面的功效也已在不少國家顯現。目前山東已經推行公務卡制度，在陳華看來，利用便捷的金融手段對政府公職人員進行監督，是「反腐」利器，有助於打造廉潔高效的政府，因此應積極發揮金融工具的監管作用，打造「陽光政府」。

他同時強調，不容否認的是，按照國內現行的財政監管制度，政府的收支狀況是由政府自己提供的，而不是由獨立的第三方出具審核結果，因而

這種監管和財政公開往往流於形式，難以起到效果。而且就目前各政府網站上可以查詢到的財政收支列表而言，支出條目不夠精細是廣泛存在的問題，民眾無法從中得知每一分錢都用到了哪裡。一個真正完備的財政監管體系應當是，政府應公開每一筆支出的去向，而民眾又能從金融系統中查詢到該筆支出的流轉狀況。就此而言，我們的財政公示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陳華坦言，從技術層面而言，目前我國大範圍推行利用金融工具對官員資產進行監督完全可行，「但層層阻力造成至今成效甚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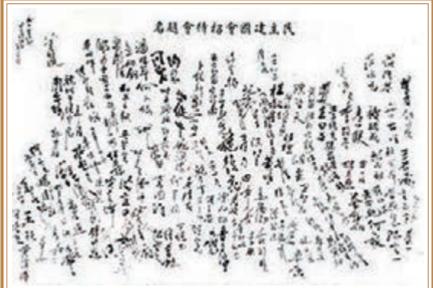
# 人民政協的「前世今生」

## 面對面的較量開始了

宿正伯



周恩來(左一)與舊政協民盟代表合影。資料圖片



1946年1月8日，民建首次舉行公開招待會，向舊政協提出了停止內戰、結束一黨專政、開放政權、釋放政治犯、檢討國民黨政府的經濟政策等意見，這些意見，受到中共的熱情支持。圖為參加招待會的中共和各方面人士的簽名。資料圖片

1946年1月10日，萬眾矚目的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拉開帷幕。

讀歷史，我們難免要追問一句：為什麼要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最初不是屢次說要召開國民大會嗎？其實，這便是筆者在文前不厭其煩交待歷史背景的原因所在。

首先，從法理上看，國民黨以黨代政的訓政時期，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體制。既然設計了從軍政到訓政再到憲政的建國路徑，那麼便必須完成制憲、立憲的任務。制憲、立憲，就要涉及國內各黨派的政治安排，必然有一番討價還價過程。時間越往後推，利益糾葛便越是複雜，各黨派羽翼漸豐時必須在國民大會之前召開黨派會議來確定框架協議。所以說，孫中山的三步走建國理論客觀上為國民黨挖了「坑」。如果當初一步到位立憲立國，也許後期的發展就不致如此，至少問題的處理方式會有很大不同。當然，蔣介石自身對獨裁體制的享受，也決定了他必然會擁護訓政理論，必然會拖延立憲的來臨。這在一定程度上無異於自作自受。

其次，從事實上說，經過八年抗戰，中國共產黨的力量已今非昔比，共產黨

領導的軍隊由抗戰初的3萬餘人發展為1945年的120多萬人，另有民兵260萬人。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人口近1億。共產黨深入敵後開展人民戰爭，贏得了基層民眾的支持。而且，國共第二次合



張君勱(1887~1969)，中國政治家、哲學家，中國民主社會黨領袖。推崇唯心主義哲學，被稱為「玄學鬼」。曾參與組織中國民主同盟。後在海外組織「中國自由民主戰鬥同盟」，以「第三勢力」自居。資料圖片

作，已經使得共產黨和特區政府的地位得到了認可。如此強大的力量和如此廣泛的存在，使得國民黨及其領導下的軍隊、政府都不能不視共產黨的存在。協商建國，勢在必行。

此外，民主黨派的合法化和不斷發展，也使得國內政治局發生了重大變化。不僅不再是國民黨一黨獨大，甚至也不是國共兩黨說了就可以算，而是真正正地出現了左、中、右三種力量。原有的國民大會已經不能囊括各種政治力量，不能完全代表民意。

所有這些匯聚到一起，決定了政治協商會議的舉行。政治協商會議的名稱，最初曾有過黨派會議、政治諮詢會議、政治會議等多種提法，最後採納的是重慶談判時國民黨代表之一張治中將軍於1945年9月10日提出的「政治協商會議」。

重慶談判之後，本預定1945年11月初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由於國共雙方軍事衝突不斷，不得不延期。國內外要求盡快舉行協商的呼聲風起雲湧，政治協商會議最終確定在1946年初召開。

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中國國民黨代表是：孫科、吳鐵城、陳布雷、陳立夫、



張厲生、王世傑、邵力子、張群；中國共產黨代表是：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葉劍英、吳玉章、陸定一、鄧穎超；中國民主同盟代表是：張瀾、羅隆基、張君勱、張東蓀、沈鈞儒、張申府、黃炎培、梁漱溟、章伯鈞；青年黨代表是：曾琦、陳啟天、楊永浚、余家菊、常乃德；社會賢達代表有：莫德惠、邵從恩、王雲五、傅斯年、胡霖、郭沫若、錢永銘、繆嘉銘、李燭塵。與會38名代表，圍繞政府組織、施政綱領、軍事、國民大會、憲法草案等5項議題，展開了激烈的討論。

連載⑩